

阎纯德 主编

中國現代女作家



阎纯德 孙瑞珍 白舒荣 李
杨

中國現代女作家



封面题签：茅 盾
责任编辑：王 燕
封面设计：姜 录

中 国 现 代 女 作 家

阎纯德(主编) 白舒荣 孙瑞珍 李杨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牡 丹 江 印 刷 总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 张 16 4/16·插 页 4·字 数 877,000

1988年 6 月 第 1 版 1988年 6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9,350

统 一 书 号：10093·491

定 价：1.70 元

出版说明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六十余年来，女作家从寥寥的晨星，已经形成空前灿烂的星群。研究她们，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早在三十年代，女作家的成就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先后出版过阿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北新书局，1931年）、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以及《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作家自传选集》等一些论述或谈论女作家的创作或生活的书籍。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关于女作家的介绍或研究颇显冷落，即使在各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类书中，也只是对主要的几个女作家作了评介。总的说来，无论是深度或是广度，都是不够的，对不少有较大成就和影响的女作家，多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出版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可望将那些曾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发展和繁荣尽过力的，或正为之奋斗的女作家，都收录进来，让历史永远唤起自己的回忆，而不是自我遗忘。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出版的这部女作家评传，从“五四”运动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到八十年代的后起之秀，所有的女作家，都是有所建树的。她们的成就和她们的成功之路，当然具有她们的天才和她们的艰苦奋斗，但更为主要的，只有把她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才迸发出夺目的火花，形成灿烂的星群，这对现代

的青年作者投身于四个现代化的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从事文学创作，是大有效益的。这是本社出版这部女作家评传的根本目的。

本书的作者，阎纯德（主编）、白舒荣、孙瑞珍、李杨同志，远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就开始酝酿，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一九七七年以后，在乾坤复苏、春意盎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广泛地做了调查、访问，查找了大量资料，做了艰苦的研究工作，才开始撰写。不仅翔实地记述了女作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并对她们的作品作了一些评论。在评论中，充分肯定了她们各自的艺术风格。灿烂的星群，各有各的风格，百花繁茂，丰富多采，这对现代的青年作者，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茅盾先生生前为此书欣然提签，为我们留下了深远的怀念。

这部女作家评传，将分册出版，每册的排版，都以姓氏笔划为序。有些女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台湾省的女作家，既不能通信，也不能采访，暂时难以文，只好留待日后介绍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从作者到编者，力求史料可靠，评论公正，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客观条件和个人经验、学识的局限性，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6月21日

《中国现代女作家》序

王 瑶

鲁迅在回答青年文学爱好者如何看文艺作品时曾说过：可以先选看自己最爱看的作家的作品，“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而已集·读书杂谈》）可见记叙作家生平及创作道路的传记性质的书籍，对于读者理解作品内容及创作背景，是如何重要的了。但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这类书籍或文章，除鲁迅、茅盾等少数人以外，目前还很少；而对于早已拥有大量读者的许多现代女作家来说，就更其是空白了。三十年代初，由于“五四”以后涌现出了一批受到读者注意的女作家，因此也曾出现过《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作家自传选集》一类书籍，但或则流于丛谈，或则限于体例，都谈不上对创作道路的认真考察，于读者理解作品的帮助并不大，因此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现在阎纯德（主编）、白舒荣、孙瑞珍、李杨同志编写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一书，不仅规模宏大，从卓有贡献的老一辈的作家到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记叙了近百人的传记；而且编写中曾广泛访问过作家本人或其亲友，参考了有关的文献资料，花了很大功夫，因而能够比较翔实地记述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并对重要的作品作出适当的评介。可以说无论就材料的丰富可靠或评述的准确程度来说，编写者都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从这些传记中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女作家都是经历过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的。其中有为“五四”浪潮所冲击而走出家庭的娜拉式的叛逆女性，有负笈异域而始终关心人民、眷恋故国的远方游子，有的是经过曲折道路而终于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战士，也有的是经过十年浩劫而意志益坚的当代青年。她们中有的人在风华正茂的时期就令人痛惜地被摧折了，也有的则虽然饱经风霜，但在年逾古稀的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地勤奋写作。这些作家的经历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深深地刻着时代的烙印，铭记着她们勇于面向生活的脚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看，现代女作家的大批出现是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作为中国人民革命一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的，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通常总是衡量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标尺，而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就，更标志着妇女解放的深广程度。虽然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曾出现过如同李清照那样的有卓越成就的女作家，但毕竟是寥若晨星的个别现象；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和结束了十年浩劫以后的最近一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崛起，这决不是甚么偶然的现象，而是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在这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人们精神上的束缚减少了，思想活跃起来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就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这也就是现代女作家之所以群星灿烂，有别于古代情况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见，在全国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大批女作家的继续出现和成长，一定是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必然现象。

勤劳、坚韧和富有才华的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无言地肩负着重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们的生活和命运，觉醒和追求，理应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出现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和鲜明性格的妇女形象，而这是与现代女作家

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她们不仅特别关注广大妇女的命运，而且在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还渗透着她们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色彩，因而取得了艺术上的较大的成功。她们各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各阶层妇女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这些女性所承受的深重苦难以及奋斗与追求的历程。从整体来看，这众多的形象就构成了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的真实画卷，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如果说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溶入了作者的一部分生命的话，那么对于许多女作家所塑造的妇女形象来说，就更为恰切。从这种意义讲，了解这些女作家的生平经历对于理解她们作品的内容，就显得更是必要和有益了。

在艺术创造上女性作者特别赋有感受的敏锐性和表现的创造性，通过她们的眼睛所反映出来的生命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光彩，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举办的各种女画家画展，女书法家作品展览等，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文学方面也同样如此，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就曾指出，虽然小说“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在介绍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集时他也曾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可见女性作者的创作无论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还是艺术表现的风格和手法，都有男作家所难以取代的特色。她们对于生活美的细腻的感受和传达这种美的清新明丽的笔致，都带有独特的美学特点；即使在处理严酷的战争或大工业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也仍然浸透着一种对人民和对生活的深厚的执著的感情。这是她

们的作品获得读者爱好的重要原因，也是值得研究者深入考察的美学课题。

本书集中地记叙了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道路，它不仅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不仅会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参考上的方便，而且通过这些作家的生活历程和艺术经验，必将鼓舞许多有志于文学活动的女作者和女青年，更加坚韧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本书编写者的辛劳也一定会因此而得到补偿和满足。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

目 录

《中国现代女作家》序	王 瑶	(1)
丁 玲	孙瑞珍 李杨	(1)
于雁军	孙瑞珍	(39)
白 朗	阎纯德	(50)
白 薇	白舒荣	(66)
田 琳	阎纯德	(88)
叶文玲	白舒荣	(97)
冯沅君	孙瑞珍	(107)
石评梅	白舒荣	(121)
毕 方	孙瑞珍	(133)
江 帆	孙瑞珍	(143)
许广平	陈漱渝	(155)
刘畅园	李 杨	(185)
李 纳	阎纯德	(203)
萧 红	骆宾基	(221)
庐 隐	阎纯德	(253)
张抗抗	李 杨	(281)
陆晶清	白舒荣	(298)
陈衡哲	阎纯德	(309)
罗 洪	阎纯德	(325)

果向真	阎纯德	(342)
草 明	白舒荣	(357)
柯 岩	阎纯德	(374)
赵清阁	李 杨	(394)
袁 静	白舒荣	(414)
袁昌英	李 杨	(431)
凌叔华	阎纯德	(443)
董 速	李 杨	(453)
葛 琴	孙瑞珍	(461)
谢冰莹	阎纯德	(479)
潘 青	白舒荣	(504)

丁 玲

孙瑞珍 李 杨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如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间要碰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

——丁 玲

一九七八年二月，漫天飞雪……

按照事先打听好的地址，我们来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访使我们悬念的丁玲。踩着厚厚的积雪，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踏雪寻梅的故事。诗人寻梅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是诗人，但也在寻梅。丁玲不正是经过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傲雪斗艳的红梅吗？

想起她的功绩，她的磨难，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腾着一个世纪的酸甜苦辣。

当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带着慈祥的笑容，闪着和蔼可亲的目光走来的时候，当握着她那温暖的手，当谈话自然而轻松地展开，当听到她开怀的笑声时，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无影无踪了。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实实在在，可亲可近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去看她。尽管她无比繁忙，仍然乐于接

待一批又一批打断她工作的朋友、同事、外国友人，以及象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

她——革命者、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飞

秋阳落在黄熟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这一天，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二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后叫丁玲，出世的时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过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财产和威风：拥有二百多间屋子的庭院，带着窗子的大床……但在这个处在衰败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沦在酒色中。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拿银子当铜钱花的恶习。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岁出头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三岁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服、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抹不掉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母亲姓余，闺名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一声家中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她羡慕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还是在死了丈夫以后。丈夫死时，她才三十岁，家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钱的债主。

正象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悲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象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利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母亲走投无路的当儿，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员分崩离析了。一九一〇年湖南常德县城吹来了变革的风，几个留日学法政回国的青年，沟通了小城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兴办学报，组织活动，十分活跃。母亲受新鲜事物的感染，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弟兄，不愿只躲在屋里过一生。社会在变，母亲也在变，思想的冲突，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她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母女同入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的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那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青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刊《收获》1980年第1期）丁玲的母亲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不但给女儿做出了榜样，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

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诵唐诗。

寡母孤儿的处境极其艰辛。在家规森严的舅父家，丁玲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在一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位，来自舅父舅母的压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层感伤，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一九一六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一九一八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蕙蕙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丁玲写作的才能，着重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丁玲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大约是一九二一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

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这是茅盾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女作家丁玲》开头的一段话。一九二二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丁玲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它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一九二二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南京。她们住在一起，勤奋自学。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他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一九二三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识分子中受着感染和影响。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丁玲一直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

她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女，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多不曾离开的挚友王剑虹不幸